
全球范围内的美国环境想象

——生态全球主义者的反应

(美) 劳伦斯·布伊尔

龙 云 译

毋庸置疑,相对于“文化思考”来说,“环境思考”或“生态思考”更需要“排除”或“超越”国家范畴。通常情况下,司法边界并不等同于生态边界。对于北欧岛国冰岛来说,两种边界可以视为一致;但美国-加拿大以及美国-墨西哥两国间的边界则不能混为一谈。证据表明,“全球化的最原始形态”源自环境范畴,而非经济和政治领域。¹自地球上出现生命以来,物种就一直处于迁徙变化之中。单一国家从来无法通过立法对疾病、毒性微尘辐射、动植物迁入等进行有效的控制,如今更是缺乏解决上述问题的有力措施。天花在三千年的时间内遍布全球,艾滋病的广泛传播只用了三十年。特别在上世纪后半期,想象中的完整“景观”由于受到异域渗透的影响,变成了持续重构之中的“空间”,我们对于如何衡量异域渗透的了解仅仅处于起步阶段。²雷切尔·卡森和乌尔利希·贝克的社会理论明确指出,一个囊括富人和穷人的全球性“风险社会”已经形成,³在这一社会中,人们对于环境恶化的威胁持有相同的焦虑心理。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即使是那些拒绝置身于当前美国监管之下的文化,在面对全球日趋变暖的问题时无一不更趋向于从全球的角度对环境属性和环境公民身份进行思考。同时国际社会在如何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大灾难的问题上达成了空前一致。⁴

基于这一立场,以全球性视角取代以国家为中心的方法来解决环境问题,其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三十多年前,当月亮被确立为整个地球的意象以来,它就一直被作为地球的标识,并落入老套的文化模式中。⁵然而生态全球主义以

¹ 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2页。

² 芭芭拉·亚当:《时空和现代性:环境和隐藏的危险》(*Timescapes of Modernity: The Environment and Invisible Hazards*)。伦敦:路特利支出版社,1998年。特别论述了核毒性机理的长期慢性影响(特别是头脑的切尔诺贝利病)以及牛海绵状脑病(疯牛病)。

³ 乌尔利希·贝克:《风险社会:走向新的现代性》(*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马克·利特译,(1986年重印)。伦敦:塞奇,1992年,特别参见第19-84页;贝克和约翰尼斯·威尔姆兹:“全球风险社会”,见《与乌尔里希·贝克会谈》,马克·波拉克译。剑桥:政治出版社,2004年,第109-52页。

⁴ 凯伦·利蒂芬:《臭氧层论述:全球环境合作中的科学政治》(*Ozone Discourses: Science and Politics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s*)。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78-116页。注明:将所谓预防性原则作为制定臭氧协议的动机是史无前例的。参见彼得·辛格:“一个大气层”,出自《一个世界:全球化伦理》,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4-50页。这篇讨论全球变暖问题的论述促进了全球公民的伦理意识。

⁵ 分析了这一意象的用途和意义。见希拉·贾撒诺夫:“天与地:环境意象中的政治”,出自《世俗政治:本地和全球的环境治理》,贾撒诺夫和大卫·罗森伯格编辑,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231-52页。